



河姆渡文化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



河姆渡文化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杭州大学出版社

河姆渡文化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34号)

*

余杭华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75印张 269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1035-572-4/K·066

定价:18.00元

2000.2.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邮 购

序

毛昭晰

自 1973 年 6 月初河姆渡遗址发现至今,已经有 25 个年头了。其间 1973 年 11 月至 1974 年 1 月和 1977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 月进行过两次发掘。1978 年发表了第一期发掘报告。1980 年发表了《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第二期发掘报告,因为整理报告的几位学者后来都担任了繁忙的行政职务,影响工作的进行,所以这个报告到现在还没有付梓。但河姆渡遗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却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纪念河姆渡遗址发现 20 周年,1992 年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学会和余姚市,后来还有宁波市的一些同志经过多次讨论,打算在 1993 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学术讨论会最后于 1994 年 4 月在河姆渡遗址所在地的余姚市召开。可惜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我正应聘在日本京都任职,由于我在日居留的手续和归国的手续来不及办理,因而未能参加盛会,到现在还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我们请作者作了修改。有些文章当时是简单的提要,也请作者整理成文。所以现在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包含了 1994 年之后的若干科研成果。

在河姆渡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稻作农业。这不仅仅是

因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多,保存完好,还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农具,这是其他任何遗址所不及的。在河姆渡稻谷发现之后不久,游修龄、周季维等先生曾经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近几年对河姆渡稻谷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第一是发现了四粒野生稻,证实了河姆渡可能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第二是根据植物硅酸体的分析以及稻的叶绿体 DNA 基因片段图谱的分析,河姆渡的稻谷主要是粳稻。用扫描电镜观察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的双峰乳突,也发现粳型谷粒。这和以前游修龄先生以稻谷长宽比例测定的结果不同。据此,对稻谷传播的路线也产生了与以前不同的看法。第三,由于彭头山、贾湖、玉蟾岩等遗址发现了比河姆渡更早的稻谷遗存,所以在稻作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些问题在游修龄、郑云飞、严文明、张文绪、汤圣祥、刘军等先生的文章中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石兴邦、吴汝祚等先生则从生产工具、建筑遗存、日用器皿、原始崇拜等等方面对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进行阐述。石兴邦先生还对河姆渡文化的溯源和追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使人很受启发。

张之恒先生研究了河姆渡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据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结合民族学的资料进行推测,认为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尚处在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

河姆渡遗址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不可能是孤立的史前聚落。刘军、蒋乐平、林士民、王海明等先生介绍了与河姆渡文化有关的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论述了它们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的关系。要搞清楚这种关系,首先应该弄清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的内涵。刘军、蒋乐平两位先生认为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与成熟性充分体现了河姆渡文化的精义。有的学者也认为河姆渡文化应

以第三、四层为限。安志敏先生提出河姆渡遗址的第一、二层“不宜归入河姆渡文化,当与马家浜文化或良渚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刘军、蒋乐平先生则明确地认为“良渚文化钱塘江以南类型的提法可以成立”。林士民先生也提出了“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类型”的概念。相似的观点也见于林华东等先生的论文。把河姆渡文化遗址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对比研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研究最终打破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旧观念。

有的学者把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林华东、韦立立先生把河姆渡文化和越文化联系起来,论述了稻米和有段石铳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道路,以及古代中国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曾骐先生认为河姆渡人是舟楫发明和征服海洋的先导。杨成鎰先生也认为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海洋是他们的驰骋之所,是他们带着水稻向东海和东南亚发展。这是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关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问题,黄宣佩先生把遗址各层年代作了系统的排比,并与江浙地区和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进行比较。根据出土器物、动植物群以及植物孢粉作分析,认为原有的年代测定偏晚,河姆渡上限的年代似和裴李岗文化相当,可能处于距今7800—7100年阶段。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新观点。

在这本文集中,有许多民俗考古学的文章。如蒋卫东先生对涡纹、湖沼崇拜和鸟形器的研究,刘军先生对河姆渡原始雕塑的研究,俞为洁女士对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的研究以及黄渭金先生对无头葬及肢骨不全葬的探讨,都很有价值。陆洲、华光先生研究了河姆渡出土的骨哨,认为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已掌握了孔位和音高之间的关系规律,并且已具有对某种音

阶的认识,这使人非常感兴趣。不过河姆渡出土的骨哨并不如他们所说的是“世界管乐之祖”。因为1986年至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10多件骨笛,大多为7孔,其年代距今7600年以上,比河姆渡的骨笛要早。而在欧洲的英国、法国、乌克兰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则发现了更早的骨笛,在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曾发现一支用雄鹿角做成的笛子,一面有4个孔,另一面有2个孔,年代在1.2万年至1.5万年之前。在英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Kent's Cavern 也发现用兔子胫骨制作的一支骨笛,上面有6个孔,年代也很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有许多创造发明的“世界之祖”,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管乐器并不在河姆渡。

在这次学术讨会上还有许多很好的学术论文,如刘为纶、周子康等先生关于古气候的论述,叶树望先生关于原始历法的研究,邵九华先生根据古代传说对河姆渡文化的探讨,以及其他许多先生的文章,我们都刊载在这本集子里。这些论文反映了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对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成果,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读者对河姆渡文化的了解。

最后,要感谢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先生、余姚市副市长蒋赣平先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先生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大力支持。刘军先生和考古所的蒋卫东先生为文集的出版和校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萍女士为河姆渡文化编制了文献目录,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谢。

1998年5月于杭州花园北村

目 录

河姆渡文化——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

农业”的拓殖者·····	石兴邦(1)
河姆渡遗址浅析·····	安志敏(18)
从羽人纹饰看羽人源流·····	毛昭晰(20)
河姆渡野生稻发现的意义·····	严文明(32)
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游修龄 郑云飞(37)
水稻品种和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乳突的扫描 电镜观察·····	张文绪 汤圣祥 刘 军(47)
河姆渡遗址的几个问题·····	吴汝祚(57)
关于河姆渡遗址年代的讨论·····	黄宣佩(76)
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探讨 ·····	刘 军 蒋乐平(84)
从宁绍地区的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林士民(100)
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	邵九华(118)
河姆渡文化渊源思考·····	王海明(128)
论河姆渡暨越文化的海外传播·····	林华东 韦立立(141)
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	杨成铨(175)
河姆渡文化原始雕塑·····	刘 军(188)
河姆渡文化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新探·····	俞为洁(197)
河姆渡先民的原始历法·····	叶树望(209)

试论河姆渡无头葬及肢骨不全墓·····	黄渭金(217)
涡纹·湖沼崇拜·鸟形器·····	蒋卫东(227)
原始艺术科技的结晶——河姆渡出土骨哨	
·····	陆 洲 华 光(243)
未来气候变暖的经验模式	
——浙江河姆渡古气候·····	刘为纶 周子康 吴维棠(248)
河姆渡地区中全新世温暖期古植被和古气候	
的研究·····	周子康 刘为纶 吴维棠(258)
河姆渡人在中华文化缔造中的贡献·····	曾 骥(269)
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张之恒(278)
河姆渡文化文献目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285)

河姆渡文化——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农业”的拓殖者*

石兴邦

一、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当时我国有三个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发现:一个是下川细石器文化遗存(1970~1973),当时认为是典型的中石器文化;另一个就是河姆渡文化(1973)^①,它是稻作农业文化最早而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还有一个便是磁山—裴李岗文化,它是前仰韶文化的首次露头(1976~1979)。其所以叫它们的显世为突破性的发现,是因为这些文化遗存及其包含物,正是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环节,而且是关键性的环节,它们填补了这个缺环,所以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特别重视:下川文化提供了由采猎经济向采集农业过渡性的文化丛体;磁山—裴李岗以及老官台文化提供了早期粟作农业的垦殖者和彩陶的发明者;河姆渡文化却是早期稻作农业的典型代表。这三个文化本身的内涵和特征,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史前文化史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从

* “采集农业”一辞,是1996年初,田昌五同志与作者讨论问题时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的很有理论意义,并从中加以论证。

此,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一下开拓了视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把农业起源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并迅速地开展而取得成果。

河姆渡文化发轫滋长于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聚落散布在滨江沿海和山麓下的平地 and 山坡上。这里是早期人类生活的最佳的丰富的食物采集区,很宜于早期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而河姆渡人本身居住的聚落,赋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海拔低,地下水位高,文化层长期浸泡水中,隔绝了土壤中的空气,大面积的腐殖质形成4~5度酸性成分,起着良好的防腐作用,使大量的文化遗存和品种丰富的动植物枝叶和遗骸,完好地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探讨这一文化的珍贵资料。

根据发掘者的记录,河姆渡聚落遗址,分四个文化堆积层,第一、二层是晚期遗存,第三、四层是早期遗存,特别是第四层时间最早而包含物最丰富,是河姆渡文化得以命名的文化实体的存在层,代表了这一文化的主体文化面貌和模式。其内涵所体现的工艺技术之精,生产力水平之高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是任何一个稻作文化聚落遗存所不及的。所以,自发现20多年来,以其独特之内涵,丰富之埋藏,年代之久远和价值之珍贵而享誉学坛,播扬寰宇。

二、有关稻作农业文化的讯息及物化形态

河姆渡文化是早期稻作文化的遗存,其丰富的埋藏,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文化完整模式的各种讯息和载体。

(一)保存了诸多与农业起源有关的植物标本和遗迹^②

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特别在主体文化堆积层中,普遍存在稻谷、谷壳、谷秆和枝叶的堆积,厚达20~50厘米,最厚

达1米,有的还保存谷粒,有的已炭化,有的还保存叶、秆的原形,连壳上的稃毛和叶脉都依稀可见。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经过鉴定,属于籼亚晚稻型水稻,是我国最古老的稻类实物遗存,此外还有野生稻种子、菱角、橡子、桃子、菌类、藻类、葫芦等植物,其中有些已为人们所栽培^③。

(二)有一套木制、骨制和石制的稻作农业工具

其中木制和骨制工具特别突出,这是其他居址所缺乏或不常见的。它的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有数千件之多,种类有耜、铲、刀、斧、镑、凿、镞、锥、针、锯、匕、桨等,其中以骨制的耜为最典型。^④数量多,形制新颖,制工精巧,表示农业生产水平高。这种骨耜,是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和胯骨制成的,是采用竖长安柄的方式使用,正面中间修出一道浅的凹槽,柄部有横穿的长方形孔,耜面刃上两侧穿凿两个圆孔,用以扎捆柄体,柄部手握部分作成了T字形或透雕成三角形把手,便于手持使用,是十分技巧而科学的工具。这种工具的作用,在水田中工作,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它证明了河姆渡人是最早的耜耕农业者。

(三)制备了一套水乡定居生活的各种设备和条件

1. 干栏式的居室和聚落结构。

河姆渡人居住的是栽桩架板式的干栏建筑,结构形制都相当进步,其营造技术,并不亚于今日南亚一带人住的干栏房屋。这种建筑是用圆柱、方柱和板桩作桩木,其上架横板和竖板,桩架交接处用卯榫套节,再上立柱,架梁,盖顶,高于地面。整个建筑呈长屋式。在早期遗存中,发现一座长23米、宽7米,前廊还有1.3米的过道,作西北—东南走向。这种建筑形式,体现了大家族式的社会组织。

另外还有一种居室是平地栽桩式的地面建筑,用木板垫作柱础,红烧土块和碎陶片铺地,层层加垫打实,然后再在其上建

筑,这是晚期的居室,这时可能气候变得干燥些,人们舍干栏而就平居。

在干栏建筑的遗存中,发现出数千件木质构件,这里面有长达6米、直径23厘米的圆木立柱,板桩中有宽10~50厘米,厚2~4厘米的规则板材。从其结构看,榫卯构件都是垂直相交。在承托木梁、屋梁柱头和柱脚上,还保留近似方形的榫头和卯眼。其中较进步的是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可以防止构件受拉脱榫,在两侧伸出规整的齿口的木板,还在两侧向里刨出了规整的齿口的木板,据建筑学家研究,这是高精度的密接拼板技术。

2. 来源多样的丰富的水乡生活资料。

河姆渡人的生活资料,来源于居址附近丰富的自然库存。他们渔猎采集,获取各种品类的食物和衣着用品,主食是稻米,猎获的动物有48种之多,其中有十几种鸟类,七八种水生鱼类和蚌类,还有取之不尽的植物果实和叶茎、菱角、橡子等,这些生活资料能充分满足人类体质需要的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对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发育大有补益,这也是河姆渡文化繁荣滋长的内在动力。

3. 轻便的水上交通工具。

河姆渡人居住在水乡,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沼泽相望,往来交通多靠水路,发现的木桨证明舟楫之制早已制备。

根据河姆渡人制木工艺水平和对机械原理的理解水平(从木构榫接技术中可知),不只是用木筏或独木舟,可能制造用木板结构的较大的船体,航行水中、聚落和部落之间,畅通无阻,甚至远航到近海岛屿和更远的地方去。河姆渡人是古越人的先驱,他们是潜水的能手,潜水捕鱼为其文化特点之一。越人重纹身,其目的之一是在水中防鱼龙之害,所以习水性而乐于航海,

是水乡民族的性格之一。对原始人来说,山林是交往的一大阻隔,而水甚至是汪洋大海,不仅阻挡不住他们之间的交往,而且能促其接触。因此,近海民族之富于冒险和开拓精神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4. 简朴实用的一组日用生活器皿。

河姆渡人的日用器皿,有形可据的是陶器。这些陶器,不算精美,造型古朴而很实用。从这些陶器上,表现出了河姆渡人独特的制陶工艺。她们创造的夹炭陶艺,在古代制陶工艺中独树一帜。这类陶器,是在烧造时,在陶土中麝和大量的草筋、植物杆碎叶和种子皮壳等有机物。烧成后,这些植物枝叶变成炭,陶器呈黑色,火候较低,器壁厚薄不匀,形制也不十分规整,表现出技术的原始性,器物种类以釜、罐、盆、盘、钵等常用器为主,还有少量的盂、豆和储火尊,此外还有器盖、器座。日常生活用的炊器、饮食器和储物器均有,以圜底器为多(原始性之一),主要器物是圜底釜,用支垫以供炊煮。这种支垫是河姆渡人的创造,以后向周围扩延,北可到淮海地区。可以想象,除陶器外,河姆渡人也用木制和编织的器物,其陶器中六角形口沿的盘,当是仿编织物或木制器物而制作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样的制陶工艺中,出现了彩陶,虽然是几块碎片,却不能忽视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迹象观察,彩陶制法,也较特别。它是在已饰绳纹或划纹的陶器外壁上,涂上一层稠浓的陶衣,打磨光滑后绘彩,烧成后,表面作灰白色的光亮面,纹彩则呈黑褐色或褐色。有着浓厚的地方特点,当为本地所制作。但从其纹样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与中原讯息交通后而制造的。这是我国稻作文化区最早的彩陶了。它的出现比白家文化的彩陶要晚数百年时间。

(四)有一套崇信的祭祀活动和信物

这些意识形态的物化形态,都体现在日用器物上并形之以图像,有陶器、象牙和骨板上刻划的动物和自然物的图像。过去总认为它们是一种艺术作品,实际它包含着寓意很深的观念形态,从已知的图像解释,至少有三种含义:

1. 祭祖意识,属图腾崇拜活动的遗留,主要是鸟类图形包含的寓意,有鸠和凤两种。这两种鸟是东南沿海地区,古代人们普遍的崇拜物^⑤。这些崇拜物图像,总是作为氏族的标帜和徽号刻划于日用器物 and 法器上。

2. 生产性的祭祀活动(农业和渔猎采集活动),以农业祭祀活动为主(播种或收获季节)。表现这类活动的图像,有丛生的谷物,盆中栽种的植物,家畜类猪的图形,旁边还有侍祭的鱼或鸟。

3. 崇拜太阳的祭祀。这是吴汝祚同志最近提出的一种看法^⑦。他认为,骨匕残柄雕刻的双头鸠中间的同心圆,就象征太阳。另一件双凤夹侍的周围有烈焰的同心圆也是太阳。这些图像,与中国古代的“乌负日”的神话有联系。还有一个陶纺轮中间围绕圆孔,作一“十”字纹,外围以锯齿纹。根据民族学材料,这些符号是象征太阳和生命的,在纳西族东巴文中,太阳即⊕形,与此有相通之处。这些看法都值得重视。总之这些图形,有一定的含义,以已有的知识来说,较接近于这类崇拜。

意识形态上的种种表征物,说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和当时较丰富的物质生活一样,表现出思想范畴内的种种活动,根据不同目的、类别和需要而进行巫术祭仪活动。这种文化模式是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相当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

三、有待探索的几个问题

河姆渡文化是发展阶段中的氏族部落文化,是相当成熟的稻作农业经济模式,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丛体,不论它存在多长时间,现在看来它还是孑然一身,与它相邻的诸文化及其特征,比较之下,尚难完全衔接起来,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竟这是文化系统的不同,还是发展阶段的断隔,都需要探索,对这个问题,学者多有论述,但未作定论。

就当前研究的现状看,长江下游的滨海地区,有两个主要的文化族群:一个是偏北的三角洲及太湖周围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传统;一个是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传统,前者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族群,后者却是有创造业绩的先驱。在学者们的论述中,一般把河姆渡文化与罗家角文化遗存当成相并存的一个族群,发展的典型时期两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而后的第一、二层堆积则和马家浜文化有密切关系。隔一杭州湾,两岸有如此不同的差异,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河姆渡文化的研究任务之一是溯源追流。

(一)关于溯源问题

追溯河姆渡文化的源头,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陶器的祖源,二是农业起源。

1. 关于陶器的祖源探索,是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伴发生和发展的,两者有较密切的联系。陶器是聚落生活的标示器,人们在定居后,必须解决炊煮和取水两件要事,陶器就应需而生。在一般聚落生活中都有陶器存在,它代表着一定的文化模式和经济生活的特点及地区的族群个性,各氏族部落都会相应地解决自己切身生活的问题,一旦突破,即蔓延开来,形成独具特征的

文化类型品。

河姆渡文化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 6730 ~ 6960 年,距今 7000 年左右,我们现在见到的陶器是跨了几个发展阶段而较为成熟的器用。根据已发现最早的陶器讯息。在它之前至少还有三四千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陶器的起源,无疑是多源的。分布在各个文化形态下的氏族部落,以其自己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需要和传统,而制造所需要的器用。目前全国发现几处 1 万至 1.2 万年前的陶器,各地区的文化各有特点,但其原始性和普遍型则是一致的。这些发现以南方稻作文化区的较多,所以在陶器的溯源问题上,在稻作农业文化中有最大的优势。

在稻作文化区发现较早的陶器遗址有广东英德的青塘遗址,距今 9000 ~ 7000 年,桂林的甑皮岩 9000 ~ 7600 年,特别是最近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杯遗址,出土的陶片有 1 万至 1.4 万年之久,是至今发现最早的陶器,这些陶片,胎体厚重,内夹粗砂,烧制火候低,表面用草具搓擦了紊乱的条纹装饰,多具陶制品原初形态的特征。还有一个地点是湖南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的玉蟾岩遗址^⑧,也发现早期的陶片和打制石器,发现同志认为它是旧石器,以及人工干预的野生稻和初期栽培稻遗迹,时间距今在 1.2 万年左右。这批资料我曾看过,有一大堆似为底器的底部,壁厚,色杂(黑褐夹灰褐,质松脆),内夹大砂粒,是用手捏成的,确为带原始性特征的陶器,我们把它视为最早的陶器标本。

从这些早期陶器的特点,与今日江西、湖南距今 6000 ~ 7000 年左右的陶器特征相比,相隔几个发展阶段,同样,河姆渡文化陶器的创始阶段可以上溯三四千年,从各地陶器特点看,都有自己的原初形态和特点。